儒家文化传统与当代企业创新

才国伟 谢佳松

摘要: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利用手工搜集的历史孔庙数据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验证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当代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促进效应。在考虑企业管理者籍贯地和其他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在机制路径中,儒家文化传统通过影响企业内部金融资产配置和股权分布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通过改变企业外部社会机会结构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综上,从企业视角切入,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深入理解儒家文化思想内核的长期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关键词: 儒家文化; 企业创新; 金融资产配置; 代际流动

DOI: 10. 19836/j. cnki. 37-1100/c. 2020. 06. 005

一、引言

创新是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①。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引领发展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三者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逐渐步入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对于私营部门来说,企业是进行创新活动的主体。但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内部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现有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角度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分析:一是从企业内部因素剖析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④⑤⑥;二是从正式制度或政策冲击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讨论⑦。多数文献聚焦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管理方式或企业外部正式制度约束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短期作用,而较少关注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创新策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要想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仅局限于近代以来所接纳、吸收和改良的种种正式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能忽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丰厚文化遗产⑧。

文化因素对于创新的影响,在经济学研究中仍方兴未艾。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中原大陆文

收稿日期: 2020-06-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外部资产结构与经济风险的跨国传导:作用机理与应对策略"(19YJA790001)。

作者简介: 才国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caiguow@mail. sysu. edu. cn);谢佳松(通讯作者),中山 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xiejs3@mail2. sysu. edu. cn)。

- ①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pp. 71-102.
- ② 孙亚南、王晓策、刘岩:《新时代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管理学刊》2019年第5期。
- 3 Qian H., "Diversity Versus Tolerance: The Social Driv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S Cities", *Urban Studies*, 2013, 50(13), pp. 2718-2735.
- ④ 沈国兵、袁征宇:《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 ⑤ 孔东民、徐茗丽、孔高文:《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经济研究》2017年第10期。
- Sakaki H, Jory S 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wnership Stability and Firms'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9, 103, pp. 10-22.
- ②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 ⑧ 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化为主的大国,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社会秩序基石及制度正当性根据,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早在20世纪,李约瑟就认为儒家文化对于科学技术创新的贡献是消极的①。无独有偶,马克斯·韦伯也曾提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家族主义会导致裙带关系,并且阻碍个人创业精神的发挥,因此不利于经济发展②。近年来,大量经验证据丰富了儒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包括对企业行为、商业道德及女性工作参与率的影响③④⑤,但尚未正面驳斥由来已久的"李约瑟之谜"。究其原因,一是文化因素的深层次力量常常易被忽视;二是文化因素自身的隐蔽性与不可观测性为经验分析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在学术界讨论文化对于创新影响的相关文献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采用微观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刻画一个国家或种族在某一文化维度上的共同趋势,包括但不限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人际关怀导向等等⑥,并发现了这些细分的文化维度对创新行为的影响⑦;二是从文化多样性角度解释创新活动的差异®,讨论多样性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对创新形成的重要性及内在逻辑⑨,如董事会结构的多样性会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⑩;三是强调社会信任对创新的促进作用⑪⑫,其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加强风险承担等途径释放企业家精神⑬。

对于中国而言,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儒家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在自古至今的两千年文明传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自西汉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来,通过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逐步构建国家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进而成为历代国家的正统思想^强。冯晨等发现,儒家文化传承能够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累积,具有长期效应^⑤。古志辉也发现了儒家伦理可以降低现代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路径^⑥。儒家文化甚至可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34页。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荣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8-159页。

³ Du X.,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Board Gender Divers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6(2), pp. 399-436.

① Du X.,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32(4), pp. 661-716.

⑤ 古志辉:《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⑥ 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管理世界》2015年第2期。

Dockstedt J. C., Druehl C. T., Mishra A., "Problem-solving Effort and Success in Innovation Contests: The Role of National Wealth and Nat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5, 36(1), pp. 187-200.

⑧ 潘越、肖金利、戴亦一:《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金融研究》2017年第10期。

Qian H., Stough R. R., "The Effect of Social Diversit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Measur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sight and Innovation Policy, 2011, 7(1-3), pp. 142-157.

Hafsi T., Turgut G., "Boardroom Diversity and its Effect on Social Performa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2(3), pp. 463-479.

① Liu C. Y., Ye L., Feng B.,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ial Tran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2(3), pp. 681-696.

⑫ 谷磊、吕冲冲、杨建君:《社会资本对西部地区创新产出与创业水平影响的研究》,《管理学刊》2019年第3期。

③ 周广肃、谢绚丽、李力行:《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管理世界》2015年第12期。

④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41页。

⑤ 冯晨、陈舒、白彩全:《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根源:制度差异、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⑥ 古志辉:《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以影响企业董事会的性别构成,影响公司治理①。徐细雄和李万利的研究与本文较为接近,他们发现儒家文化可以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专利侵权风险②。

本文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伦理基础和哲学思想,儒家文化对当代企业的创新活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儒家思想的很多核心观念均体现了超前的科学性和创造力。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提倡推究事物原理,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这种科学性的价值观念必然会熏陶个体培养实验探索、激发实事求是的精神。《礼记·大学》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勤于省身和动态的角度来强调及时反省和创新改革的思想。尽管许多人曾批评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伦理观,如以"中庸"之道求和谐相处、崇尚"文以载道"等尊德性的伦理道德规范,但也忽视了儒家承认私有产权正当性、保护契约关系、尊重个体经济理性的经济思想。第二,自汉代以来确立以儒家为官学的同时,还确立了以儒家道德标准来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原则。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西方中世纪那样严密的等级及滞固的社会结构。开放的社会结构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个人努力,使得能力更强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身抱负。充足的流动性必然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第三,儒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但构建了人们需要遵守的社会伦理规则和道德行为,还起到了教化大众的作用,使得人们在知识积累过程中,进一步进行知识的更新与创造。此外,历史上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使得批评儒家思想的论断难以立足。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下述理论假说:儒家文化传统可以促进当代企业创新。

三、实证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模型设计

为度量儒家文化对于现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RD_{ited} = \alpha + Culture_{c}'\beta + X_{it}'\gamma + Z_{c}'\eta + \mu_{d} + \nu_{t} + \varepsilon_{ited}$$
 (1)

其中,下标i、t、c、d分别表示表示企业个体、年份、企业所在地区及企业所属行业。被解释变量 RD_{icd} 代表了属于d行业的i企业在第t年的创新绩效指标,包含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专利申请数量及发明申请数量等;核心解释变量 $Culture_c$ 为地区孔庙数量。地区的孔庙数量越多,代表了该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强。在本文后续分析中,还选取了地区清朝进士数量、现存孔庙数量等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及检验。 X_i 为一系列企业的财务指标, Z_c 为地区变量指标。 μ_d 、 ν_t 分别为行业固定效应及年份固定效应, ε_{icd}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07-2017 年沪深两市的所有 A 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原始样本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宏观指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了保证所研究企业为实体经济部门企业,本文 对数据进行了筛选:首先,剔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其次,剔除当年 ST 公司的样本,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 1 的样本的异常样本;第三,考虑到西藏地区的特殊性和不可比性,删除了注册地在西藏的上市企业样本;最后,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从企业的创新投入及专利申请数量两个维度度量企业的创新活动^{③④}。其中,采用研发投入占期末总资产比值计算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比例,从专利数量维度考虑,相较之授予年份,

① Du X.,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Board Gender Divers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6(2), pp. 399-436.

② 徐细雄、李万利:《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金融研究》2019年第9期。

③ 周铭山、张倩倩、杨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投入与市场表现:基于公司内外部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④ 沈国兵、袁征宇:《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经济研究》2020 年第1期。

申请年份能更准确地刻画创新产出①,因而本文采用企业每年专利申请数度量企业创新活动的产出绩效。此外还构造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第三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重要组成部分。孔庙作为国家推崇儒家思想的象征,是历代承载以道德为核心价值观的建筑。孔庙不仅对古代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累积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还对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唐贞观四年,太宗为推崇儒学思想,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孔庙,即谓之"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孔庙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个体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习惯,进而对现代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尽管儒家文化因素难以量化,但仍可通过其外在的遗留特征进行判断。而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符号,历史中孔庙数量的空间分布就可以为我们理解不同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提供可以量化的具体指标,进而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本文手工搜集整理自唐代以来地区历史孔庙数量及现存孔庙数量,用以度量地区儒家文化强度。此外,本文还构造了地区进士数量量化儒家文化因素佐以稳健性检验。

四、基本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结果

表1为式(1)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至(3)列未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第(4)至第(6)列控制了两种固定效应。被解释变量依次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当年申请专利数量及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由表1可知,无论采取哪种指标度量企业的创新绩效,地区孔庙数量均显著提高了该地区企业的创新水平。表明儒家文化至少能够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活动和绩效,与预期相符,证实了前文假说结论。

	(1)	(2)	(3)	(4)	(5)	(6)
	研发投入比例	专利数量	发明数量	研发投入比例	专利数量	发明数量
孔庙数量	0.0066***	0.0160*** (0.0046)	0.0067** (0.0027)	0.0034*** (0.0006)	0.0137*** (0.0045)	0.0059** (0.0026)
基准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N	N	N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N	N	N	Y	Y	Y
观测值	19977	19977	19977	19977	19977	19977
R^2	0.2625	0.0291	0.0161	0.3292	0.0336	0.0187

表 1 基准回归

注:观测值为企业层面,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分别代表估计参数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Y表示控制了该变量或固定效应,N表示未控制该变量或固定效应。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换用地区现存孔庙数量及清朝进士数量等指标重新度量地区儒家文化传统;(2)为了使样本更准确,通过手工查找上市公司年报,进一步剔除其主营业务包含金融、房地产的企业;(3)为了剔除企业进入和退出对本文结论的影响,调整样本为平衡面板;(4)考虑本文被解释变量研发投入比例含有大量0值,进一步考虑采取 Tobit 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5)考虑并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交乘项,以控制行业内部系统结构、外部生存环境可能发生的潜在变化。

① 孔东民、徐茗丽、孔高文:《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经济研究》2017年第10期。

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论仍高度稳健。

五、内生性分析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了 Pooled-OLS 方法进行估计。虽然控制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但囿于孔庙数据和地区固定效应存在共线性,因此在实际回归中无法控制地区固定效应。这可能会出现内生性问题而导致估计偏误,遗漏重要变量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内生性来源。为进一步验证本文之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本文将对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如下处理和检验:

(一)拓展地区控制变量

首先,利用地区年末户籍人口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刻画人口密度①;第二,控制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及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三个变量捕捉地区文化教育或人力资本对本文核心结论产生的潜在偏移;第三,控制地区的公共服务因素,包括年末城市道路面积以及公交汽车数量。上述变量除人口密度外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数据来源为历年《城市统计年鉴》。

进一步地,本文还控制了不同地区不随时变的地理特征因素,以排除地理特征对结果的潜在干扰。古代交通不便,信息、文化及观念的横向传播受山川,河流等要素的影响是巨大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历史事件引发的人口由北向南大规模迁移,多与纬度距离相关;而历史自东向西渗透式的移民则多与经度差异相关。中国不仅经纬跨度大,地形差异同样巨大,从高原至盆地均有体现。此外,相较之内陆地区,沿海地区也多易受到外来文化、信仰及观念的冲击。综上,本文进一步控制地区的经度、维度、平均海拔以及到海岸线的距离来捕捉上述因素。拓展地区控制变量的结果由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前文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1)	(2)	(3)	(4)	(5)	(6)
		研发投入占比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女量
孔庙数量	0.0019*** (0.0007)	0.0037*** (0.0007)	0.0022*** (0.0008)	0.0070** (0.0035)	0.0069** (0.0028)	0.0087** (0.0038)
新增城市控制变量	Y	N	Y	Y	N	Y
新增地理因素	N	Y	Y	N	Y	Y
基准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观测值	16796	19977	16796	16796	19977	16796
R^2	0.3374	0.3302	0.3380	0.0226	0.0198	0.0236

表 2 拓展地区控制变量

(二)考虑企业管理人员籍贯地

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在基准分析中潜在的自然假设即为企业管理人员更易受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本质上,企业的决策不但离不开当地的文化环境影响,还无法排除包括企业管理者的文化观念影响,而这一因素更多的来自实际管理人员籍贯地或出生地。因此,本文通过匹配企业管理人员籍贯地

① 控制历史人口密度后结论仍然稳健,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关结果。

的孔庙数量代理其受到的儒家文化观念强度。同时,还可以在回归中纳入地区固定效应来允许企业在一个地区内进行比较,达到削弱内生性问题的目的。企业家高管籍贯数据来源为 CSMAR 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在最严格的控制下,总经理籍贯地的孔庙数量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表明个体文化观念也受到了其籍贯地的影响,同时以孔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仍稳健且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①。

(三)考虑其他文化因素

第一,除儒家文化传统外,由于中国人历来注重对于血脉亲情的维护,构成了特有且内涵丰富的宗族文化。而由于其植根于儒家文化并维系了严格的父系家族文化特征^②,也因此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故需要排除这一因素的干扰。参考现有文献^③,本文使用地区家族谱牒的密度度量当地的宗族文化强度。原始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家谱总目》。

第二,明中叶以来,商帮文化在中国逐渐兴起。这些地区差异性极大的商会组织深受当地儒家文化熏陶,如徽商推崇"儒风独茂",晋商推崇"学而优则商"等^④,无不透露出儒家文化深刻内涵。因此,商帮文化浓厚的地区更有可能修缮孔庙祠堂,可能影响本文核心结果推断。本文参考吴琦等研究的做法^⑤,使用地区商业会馆数量度量地方商会组织力量加以控制,会馆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

第三,是否(曾经)为省(道)级行政中心可能会影响孔庙的空间分布。由于中央政府会在地方推广儒家文化,因此省级行政中心会受到更多帝国政府的支持,故拥有的孔庙数量可能更多。据此,本文控制了地区是否为自唐代以来省级行政区划的治所所在地来捕捉这一影响。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地域间传统种植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水稻理论论证了不同种植方式对于个体价值观塑造的深远影响⑥,为此进一步控制了地区的水稻种植适宜程度,数据来源为联合国粮食署官方网站。实证结果如表3列(1)至列(4)所示,通过逐步回归依次控制上述变量。由列(4)可知,在控制了一系列因素的排他性分析后,核心解释变量仍然高度稳健。

	(1)	(2)	(3)	(4)			
		研发支出占比					
地区孔庙数量	0.0132*** (0.0039)	0.0109** (0.0048)	0.0323*** (0.0099)	0.0266*** (0.0103)			
商帮文化	-0.0125 (0.0088)	-0.0098 (0.0090)	0.0225 (0.0154)	0.0216 (0.0151)			
宗族文化		-0.0007 (0.0007)	-0.0012 (0.0007)	0.0014* (0.0008)			
是否曾为省(道)级行政中心			-1.4737*** (0.5401)	-2.1893*** (0.6554)			

表 3 进一步内生性分析 ⑦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结果,详情备索。

② 张川川、马光荣:《宗族文化、男孩偏好与女性发展》,《世界经济》2017年第3期。

③ 潘越、翁若宇、纪翔阁、戴亦一:《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④ 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⑤ 吴琦、周黎安、刘蓝予:《地方宗族与明清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⁶⁾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2014, 344, pp. 603-608.

② 本文还选用了地区贞洁牌坊密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结论仍然稳健。

续表3

	(1)	(2)	(3)	(4)			
	研发支出占比						
水稻种植适宜性				-2.7623** (1.2914)			
企业控制变量	Y	Y	Y	Y			
城市控制变量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Y			
观测值	6031	5996	5996	5973			
R^2	0.3506	0.3506	0.3510	0.3522			

六、进一步讨论: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实证分析基本已经给出了儒家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证据。这一部分将进一步探究传统儒家文化对当代企业行为的影响路径,给出更丰富的经验证据。

(一)企业内部机制一: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现有研究发现,由于"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活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多元的金融资产配置允许企业进行有效的套期保值和风险规避,进而能够在创新和研发活动中承担更多风险①。企业通过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既可以拓宽企业资金融通渠道,缓解融资约束,还能够提高融资能力和融资效率,因此可以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②③。然而,金融资产对企业不但存在"蓄水池"效应,还有可能造成"挤出"效应,即过度进行金融投资必然会挤出企业用于主营业务和创新的投入。而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配置也会带来不同的效应④,一般来说,在房地产等非流动金融资产超额回报率的驱使下,短视的企业会大量投入资金以获取收益,放弃研发创新投入。而相较之这种长期非流动资产,一般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可以对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起到推动作用,从而产生"蓄水池"效应。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始终强调着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血缘关系,在家的基础上,儒家思想同样启蒙了人们的资源配置方式及如何应对风险进行跨期合作。如按照名分等级来决定资源的配置顺序和数量、通过血缘或地缘力量分摊风险,缓解信贷约束等。因此相比于儒家传统较弱的地区,在更强的儒家文化熏陶下,个人就可能演化出更强的资源配置动机。此外,儒家文化强调远见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对长期利益的重视。综上,本文参考相关文献的设定⑤⑥,构造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和非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进行异质性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检验。

① Gehringer A., "Growth,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he Cas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3, 25(1), pp. 291-309.

² Bonfiglioli A., "Financial Integration,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6(2), pp. 337-355.

③ 鞠晓生、卢荻、虞义华:《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④ 陈孝明、张可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⑤ 胡奕明、王雪婷、张瑾:《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蓄水池"或"替代"?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2017 年第1期。

⑥ 周彬、谢佳松:《虚拟经济的发展抑制了实体经济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财经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由列(1)(3)可知,地区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当地企业配置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规模,且显著抑制了对长期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可能的原因,一是儒家文化影响了个体对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权衡,二是影响了个体对不同金融品偏好。进一步检验两种金融资产的作用,由列(2)(4)所示,持有一般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规模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体现了流动性金融工具的"蓄水池"效应,反观之非流动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在 1%的统计水平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体现了其"挤出"效应。由此可得,儒家文化传统使得个体更偏好于配置流动性金融资产且更少的配置投资性房地产的非流动性金融资产,而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和非流动性金融品的"挤出"效应共同决定了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企业有着更好的创新投入。

	(1)	(2)	(3)	(4)
	流动性金融资产规模	研发投入占比	非流动性金融资产规模	研发投入占比
孔庙数量	0.0001* (0.0000)	0.0021*** (0.0008)	-0.0001*** (0.0000)	0.0021** (0.0008)
流动性金融资产规模		3.3067*** (0.2762)		
非流动性金融资产规模				-2.1197*** (0.3956)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Y	Y	Y	Y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Y
观测值	16111	16111	13479	13479
R^2	0.3942	0.3486	0.1251	0.3391

表 4 文化传统与金融资产配置

(二)企业内部机制二:企业股权集中度

传统儒家思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中,"仁"位居首位。仁是中国古代儒家最基本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仁"在心理学中是处理人论和社会关系的核心,由于传统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因此儒学倡导人人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关系。《论语·季氏》中指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儒家也谴责"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在这种文化思想内涵下,体现了儒家反复强调的"忠恕"之道,即根本上强调了"我"与"人"的对等关系①。那么在这种道德黄金律的约束下,是否对当代上市企业股权的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认为,更强的儒家文化传统会引致更低的股权集中度,而在股权较为分散的情况下,企业会更注重长期利益,因而会增加研发投入,进而增加企业的创新绩效。

为了检验这一潜在机制,本文采用三个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分别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一股东和第二股东持股比例比值。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前三列可知,地区孔庙数量显著降低了当地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而列(4)至列(6)的结果可知,股权集中度同样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重。因此,如经验预期:地区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越强,当地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低,对研发投入的比例也会越高。概而言之,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的确是儒家文化影响企

① 高瑞泉:《论平等观念的儒家思想资源》,《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业创新策略的重要机制路径。

	(1)	(2)	(3)	(4)	(5)	(6)
	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	前三大股东 持股比例	第一股东和第二 股东持股比值	研发投入比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0.0311*** (0.0016)		
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					-0.0303*** (0.0017)	
第一股东和第二股东持股比值						-0.0043*** (0.0006)
孔庙数量	-0.0095*** (0.0030)	-0.0058* (0.0030)	-0.0368*** (0.0067)	0.0031***	0.0032***	0.0032***
企业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地区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观测值	19977	19977	19977	19977	19977	19977
R^2	0.1575	0.2037	0.0649	0.3405	0.3399	0.3300

表 5 文化传统与股权集中度

(三)外部环境:教育的代际流动性

前文的机制分析均来自企业内部的经验证据,进一步考虑企业外部环境。自汉代确立以儒家为官学的同时,还确立了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原则,进而历代王朝也着重以孔孟之道实施民众教化,自上而下推行普及式教育①。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西方中世纪那样严密的等级及滞固的社会结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甚至出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君子堂"的情形。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高流动性的社会现象②。隋唐之后,为科举而兴学重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学堂规模大幅提高,教育制度不断创新。这使得读书人即使非出身于世族或大家族外,也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成为儒家精英。他们进一步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及社会地位兴办教育、传播儒家文化,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社会流动性。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科举制度为社会流动性提供了动力,打开了滞固的社会结构。那么地区社会流动性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策略行为呢?我们认为,地区代际流动水平越高,当地企业的创新绩效也会越高。首先,较为滞固的社会结构更易形成"马太效应"。精英阶层为了维系自身的阶层的利益,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排斥其他阶层流入,导致裙带关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的个体不用具备创新精神和治理能力,仅依靠家庭的阶层优势或关系网络就可以挤出其他人才,进而影响企业策略行动。其次,在代际流动较高的环境中,能力更强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人力资本的上升渠道更通畅。这就为正式制度缺乏完善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给出了解决方案,此时若企业仍实行裙带主义,就会降低企业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淘

① 冯晨、陈舒、白彩全:《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根源:制度差异、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② 高瑞泉:《论平等观念的儒家思想资源》,《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汰^①。第三,滞固的社会结构更易形成滞固的思想观念。企业更倾向于做出风险厌恶及短视决策,而 这恰恰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路径,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方法^{②③},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GSS)2012 及2014 年的个体数据库构造省级代际教育流动流动性,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由列(1)(5)可知,地区孔庙数量和现存孔庙数量均从 1%的统计水平显著提高了地区教育代际流动,且现存孔庙数量的经济意义更显著。由列(2)至(4)可知,在基准回归中加入教育代际流动水平后,教育代际流动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 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符合经验预期。同时地区孔庙数量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经济及统计显著性均有下降。在对发明数量的回归中,这种影响甚至全被教育代际流动水平吸收了。在更换我们度量地区儒家文化的核心指标后,现存孔庙数量得到的结论仍高度一致。即代际流动水平在这个影响路径传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2)	(3)	(4)	(5)	(6)	(7)	(8)
	教育代际流动	研发投入比例	专利数量	发明数量	教育代际流动	研发投入比例	专利数量	发明数量
教育代际流动		0. 3096*** (0. 1113)	3.5319*** (0.6071)	1.5901*** (0.3092)		0.3236*** (0.1105)	3.5014*** (0.5969)	
孔庙数量	0.0011*** (0.0001)	0.0029*** (0.0006)	0.0087* (0.0045)	0.0040 (0.0027)				
现存孔庙数量					0.0027*** (0.0001)	0.0095*** (0.0020)	0.0353***	0.0008 (0.0072)
企业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地区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观测值	19610	19610	19610	19610	19610	19610	19610	19610
R^2	0.1885	0.3315	0.0350	0.0193	0.1774	0.3315	0.0351	0.0192

表 6 文化传统与代际流动性

七、结论

本文采用孔庙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量化考察了传统儒家文化对于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文章发现,受儒家文化熏陶更强的企业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绩效均高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弱的企业。概而言之,儒家文化传统促进了现代企业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检验之后仍然存在。其中,儒家文化传统通过影响企业内部金融资产配置和股权分布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通过改变企业外部社会机会结构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本文验证了儒家文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机制路径,一定程度上为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① Bertrand M., Schoar A., "The Role of Family in Family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2), pp. 73-96.

② Chetty R., Hendren N., Kline P., Saez E.,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4), pp. 1553-1623.

③ 王伟同、谢佳松、张玲:《人口迁移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一直以来学者致力于讨论正式制度对于创新的影响,而忽视了文化这种隐性因素的力量。本文由中国的经验证据给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的大问题。在当下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和下行的经济压力面前,我们更要依托弘扬传承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加强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建设创新型国家。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i Guowei Xie Jiaso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P. R.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Confucian culture is the legitimate basi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system and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order. This paper empirically verifies the important promoting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on contemporary enterprise innovation using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the listed companies' data. After considering the native place of firms' managers and other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s, the abov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I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the Confucian culture tradition influences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y influencing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the distribution of equity,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further affects the innov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impa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vides new micro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core of Confucian culture.

Keywords: Confucian culture; Enterprise innovation;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责任编辑:郝云飞]